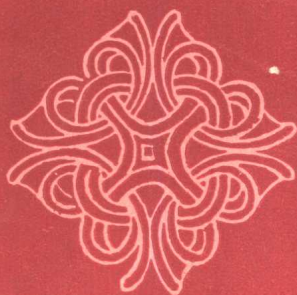


作家回忆录

相濡以沫十四年



上海译文出版社

相濡以沫十四年

〔俄〕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著

倪亮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А.Г.Достоевская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本书根据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1984年版译出

相濡以沫十四年
〔苏〕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著
倪 亮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875 插页 2 字数 376,000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ISBN7-5327-1029-7/I·556

定价: 9.7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回忆录》前言

我先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写回忆录。不用说，我自知毫无文学天才；而且，为了出版我那难忘的丈夫的作品，我老是忙得不可开交，很少有时间考虑与他有关的其他事情。

一九一〇年，我由于健康情况欠佳，精力不济，只能把这项我极感兴趣的、出版我丈夫作品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干，而且，遵照医生的嘱咐，我不得不住在远离首都的地方——那时候，我感到自己的生活中出现了空白，这空白必须用某项足以吸引我的工作去填补，否则，我就无法照此长期生活下去。

我离群索居，不参与或不直接参与当前的事件，这样，我的心灵和思想逐渐沉浸在往事之中。回忆往事，我就感到无上的幸福，使我忘记我目前生活的空虚和无谓。

当我翻阅我丈夫和自己的记事本的时候，我发现其中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详情细节，我不由自主地想把我原来速记下来的这些事用大家都懂的语言写出来；而且我相信，我的儿孙们一定对我的笔记感到兴趣，可能还有一些崇拜我丈夫的天才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很想知道费奥陀·米哈伊洛维奇在自己家中的情况。

我于最近五年中（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六年）在不同的时间里陆续写下的《回忆录》占用了几本笔记本，我尽可能把它们整理得有条有理。

我不能保证我的《回忆录》引人入胜，但我可以保证，它对某些人物的行为的描述是可靠和公正的：《回忆录》主要以记事本作为依据，而且引用信函和报刊文章中的材料加以证实。

我坦率地承认，在我的《回忆录》中有好多创作上的毛病：叙述冗长拖沓，各章节的篇幅大小不均衡，笔法陈旧等等。但是，一个七十岁的人要学会新东西是困难的；因此，为了我想把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家庭里和私人生活中的情况（包括他的全部优缺点）介绍给读者这一真挚和衷心的愿望，请原谅我这些毛病吧。

目 次

《回忆录》前言	1
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时代	1
第二章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出嫁	24
第三章 家庭生活的初期	101
第四章 在国外	144
第五章 返回俄国	207
第六章 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三年	247
第七章 一八七四至一八七五年	270
第八章 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七年	309
第九章 一八七八至一八七九年	344
第十章 最后的一年	372
第十一章 逝世。安葬	399
第十二章 费奥陀·米哈伊洛维奇逝世以后	423
写在我的《回忆录》之后	448
注释	451

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时代

—

我来到人间

在我的记忆中，我生活中经历的许多重要的事是与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我的双亲就是在耸立于这个修道院正门之上、全教区唯一的教堂里结婚的。我本人在八月三十日，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纪念日，出生于一所属于这个修道院的房子里，为我祈祷祝福和施洗礼的是修道院的教区神甫。我的亡夫安葬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的季赫文斯基墓园里；如果命运之神许可，我也将在那儿，在他身旁找到永久安息之处。所有这些情况仿佛有意凑合在一起，为的是使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成为全世界我所最珍爱的地方。

我出生于一八四六年八月三十日，那是人们称之为“小阳春”的晴和的初秋中的一天。直到如今，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纪念日几乎仍然被认为是京城里最主要的节日，在这一天，宗教行列由一大群当天不干活的人伴随着，从喀山大教堂向大修道院行进，然后返回。但是在很久以前，八月三十日这一天的庆典

比现时还要隆重：在涅瓦大街中央铺设了宽阔的木板，有三俄里^①多长，宗教行列不与人群混杂，而是在木板上缓缓地行进，金色的十字架和神幡在他们手中闪闪发光。在一长列穿着金线织锦缎法衣的神职人员后面走着一些高官显要、戴有绶带和勋章的军人，在他们后面行驶着几辆华丽的金色轿形马车，里面坐着王室人员。整个行列简直是一幅其妙无比的图画，引得全城的人都来围观。

我的父母住在那所至今属于大修道院的房子的二楼。住所很宽敞，有十一个房间，窗户是朝现今的什利谢布尔格大街开的，其中一部分窗户面对着大修道院前面的广场。^②这是个大家庭：年老的祖母和她的四个儿子，其中两个已经娶亲，有了孩子。家人们和睦相处，而且热情好客，颇有古风，碰到家庭成员的生日或命名日，每逢圣诞节和复活节，所有的近亲和远亲一早就在祖母那儿聚会，快快乐乐地度过一天，直到深夜。但是八月三十日那一天，客人们总是来得特别多，因为逢上好天气，窗子开着，观看宗教行列很方便，又加和欢乐的熟人们在一起看，别有一番乐趣。一八四六年八月三十日那一天也是如此。我那十分健康、愉快的母亲和家人们一起殷勤地接待客人们，后来，她忽然不见了，大家确信，这位年轻的女主人肯定是在里面房间里张罗酒菜；而我的母亲刚才还没料到“事情”发生得这么快，这时候大概由于疲劳和兴奋，突然感到身子不舒服，便离开众人，独自到卧室去了，一面派人去请在这种场合必不可少的人物。我的母亲身体一向很好，而且过去养过孩子，因此，即将发生的那件事并

① 1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注

② 这所房子如今还存在，而且保持着同样的外观。——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基注

没有在家里引起忙乱和不安。

下午两点钟左右,大教堂的节日弥撒结束了,响起了修道院的洪亮的钟声。当宗教行列从大修道院的正门出发的时候,站在广场上的军乐队便奏起庄严的乐曲。坐在窗子旁边的人开始请其他客人们前去观看,只听到欢呼声:“来啦,来啦,宗教行列来啦!”就在我母亲听到这欢呼声、这钟声和乐声的当儿,我那漫长的生活道路便开始了。^①

庄严的行列过去了,客人们准备动身回家,可是刚才奶奶对他们说过,她去躺一会儿休息片刻;为了想和她道别,他们仍然留下没走。到三点钟光景,我的父亲搀扶着我奶奶走进了客人们所在的大厅里。我父亲在屋子中央站定,刚才发生的事使他的心情有些激动,他郑重地宣布道:“我们尊贵的亲友们,请祝贺我有了大喜事,上帝赐给了我女儿安娜。”我的父亲性格非常开朗,喜欢插科打诨,说说笑笑,是个所谓“社交场合的核心人物”。大家都不相信这个消息,以为是节日里开的玩笑,于是就喊叫起来:“不可能!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在开玩笑!这怎么可能呢?安娜·尼古拉耶芙娜一直都在这儿嘛,”——如此等等。这时候奶奶便对客人们说:“不,格利沙^②说的是真话。一小时以前,我的孙女纽托奇卡^③出生啦!”

于是祝贺之声四起,门口出现了一个姑娘,给客人们送来一杯杯的香槟酒。大家为新生儿的健康、为她的双亲和祖母的健康干杯。太太们跑去向产妇祝贺(那时候,医生还没有提出预防

① 关于我出生的情况,我是后来听那一天在我们家作客的几位伯伯、伯母、叔叔、婶婶说的,他们的说法在细节方面有些出入。——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② 格里戈利的爱称。——译者注

③ 纽托奇卡以及下文的安尼娅、安涅奇卡均为安娜的爱称。——译者注

产妇感染的那一套)，亲吻那个“小东西”，而先生们则趁太太们不在，频频举杯庆贺新生儿，把几瓶储存的香槟酒喝个精光。据说，我来到人间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这是预示我未来命运的好兆头。这个兆头后来应验了：虽然我曾经经受物质上的艰难和精神上的痛苦，可是我认为我的生活非常幸福，我一点儿也不想改变我的生活。

在这里，我想顺便谈一谈关于我父母的情况。我父亲的祖先是小俄罗斯人，高祖父姓斯尼特科。曾祖父卖掉了波尔塔瓦省的庄园、移居彼得堡之后，就把自己的姓改为斯尼特金。我父亲是在彼得堡耶稣会^①办的学校里受的教育，但是他没有成为耶稣会会士，终生是个善良而正直的人。^②我的父亲曾在某个部里或局里担任公职。我母亲的祖辈是瑞典人，属可敬的米利托佩乌斯家族。她的曾祖父曾任路德派新教的主教，叔伯们则是学

① 耶稣会，天主教修会之一。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为天主教会反对该运动的主要集团。一五三四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创立于巴黎。——译者注

② 我的父亲曾告诉我他小时候一个有趣的插曲。他十岁的时候，在一个冬天的清晨（七时左右），沿着方坦卡河的堤岸去上学。在阿尼契柯夫宫附近，他迎面碰到一位穿着讲究的高个子先生，后者身旁站着一位衣服破旧的妇女。这位先生把十岁的男孩叫住，对他说：“你愿不愿意做件好事，跟我一起走，去当我儿子的教父，而这一位则是教母，”末了，他指着那位老妇人，补充说。我父亲是个勇敢的孩子，他毫不犹豫地跟着那位先生和老妇人走了。他们来到一个有钱人家，神甫已经在那儿等待，于是给婴儿施洗的仪式马上开始了。婴儿领过洗以后，神甫、教父和教母被邀请喝茶，用点心，而且，那位先生还给教父母各人一个金币。这样一来，时间已晚，爸爸不能去上学了，他就回到家里，叙述了自己所碰到的事。有人告诉他，有那么一种迷信的说法：如果一家的孩子都夭折，那么，为了使新生儿能够活下来，他的父亲就得请两位在孩子出生后他最先碰到的男女做孩子的教父和教母。这样，那位老妇人就成了教母，而我的爸爸成了教父。后来我父亲曾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收到教子的礼物，有一次教子病危，他还被请去为教子祝福。还有一种迷信的说法：教父和教母的祈祷和祝福能使婴儿起死回生。教子恢复了健康。后来我的父亲再也没有见到过教子；父亲曾提到过他的姓，可我把它忘了。——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基注

者。这证明，姓氏结尾的“乌斯”是这些学者们为了炫耀而加上去的，就象加上单音节词“德”或“封”一样。我母亲的曾祖辈住在阿鲍，葬在当地著名的大教堂里。有一次我路过瑞典，访问了阿鲍，我试图在大教堂里找到先人们的坟墓，但是由于我既不懂芬兰语，也不懂瑞典语，我没能从看守人那里打听到任何情况。

我的外祖父尼古拉·米利托佩乌斯是圣米赫利斯基省的地主，他的一家，除了在莫斯科土地测量学院求学的儿子罗曼·尼古拉耶维奇外，都住在庄园里。我的舅父毕了业、在彼得堡就业以后，就卖掉了父亲的田庄（其时，外祖父已去世），把全家搬到彼得堡。不久，我的外祖母安娜-马利亚·米利托佩乌斯弃世，我的母亲和她的两个姐妹仍住在兄长处。我的母亲是个异常俊美的女人——身材修长、匀称，五官长得十分端正。她的女高音特别悦耳，她那金嗓子一直保持到老年。她生于一八一二年，十九岁的时候和一个军官订婚。他们没能结婚，因为他在参加匈牙利战役时，死于该地。我母亲悲痛万分，决定终身不嫁。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的痛苦也就渐渐淡忘。在我母亲经常接触的俄罗斯人中，有一些喜欢说媒的妇女（这是当时的习俗），她们特地为她举行了一次聚会，有两个求偶的年轻人应邀而来。他们很喜欢我的母亲，可是当有人问她对那两个被介绍的年轻人是否中意时，她却回答：“不，我倒比较喜欢那个总是有说有笑的‘老头儿’。”她指的就是我的父亲。在往昔，人一过四十岁，就已经被当作老头儿了。当时，我父亲已经四十二岁（他生于一七九九年）。爸爸欢乐、愉快地度过他的青年时代，但是在他严厉的母亲管教下，他的生活很有节制；因此，在四十二岁的年纪，他仍然健康，结实，面色红润，有着一对漂亮的天蓝色眼睛和

一口完整无缺的牙齿，只是头发很稀。爸爸在他的母亲逝世以前，并不打算成家，所以在交际场合，他是个可爱的谈伴，而决不是个正在物色对象的求婚者。人家把我的母亲介绍给他，他觉得很中意，但是由于她俄语讲得很差，而他的法语又不行，因此，他们之间不能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当人们把我母亲的话转告他的时候，这位美丽的小姐的关怀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于是他便开始频繁地访问那个他能在其中见到她的家庭。临了，他们彼此相爱，决定结婚了。但是他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障碍：我母亲信奉路德新教，而按照我父亲那信仰东正教的家庭的看法，妻子必须和丈夫有相同的信仰。事情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父亲决定违反家庭的意愿，和母亲结婚，即使和家庭中某几个成员断绝关系也在所不惜。母亲得知了他的想法，担心这样做会使一个十分和睦的家庭产生分歧，她长久地踌躇不决，感到十分为难：改信东正教呢，还是拒绝她所爱的人？下述情况对她的决定起了作用：在必须给我父亲答复的前一天深夜，她久久地跪在基督受难像面前祷告，祈求主的帮助。蓦地，她抬起头，看到在耶稣受难像上方有一轮明亮的光环，照亮了整个房间，随后就消失了。这种现象又重复了两次。我母亲把这看作是一种启示，指导她从有利于父亲的方面来解决上述那个使她苦恼的问题。就在这一天夜里，她做了个梦：她仿佛走进东正教的教堂，站在祭坛边祈祷，祭坛上放着圣体盘，上面覆盖着绣有基督受难像的方麻布。她认为这个梦也是一种天启。令她惊异不置的是，两个星期后，当她来到西麦昂诺夫教堂（在莫霍夫大街）接受坚信礼时，她看到自己站在那绣有基督受难像的方麻布旁边，而四周的环境竟然与她梦中的情景一模一样。这使她的心安了下来。我的母亲改入东正教后，就开

始热心地履行教会的仪式，斋戒，领圣餐；但是，要学会用斯拉夫语祈祷在她来说是困难的，她就只得背诵瑞典文的祈祷书。对于改变宗教信仰一事，她始终没有后悔过，“要不然，”她说，“我就会觉得自己跟丈夫和孩子们之间十分疏远，而这使我感到痛苦。”

我的双亲共同生活了二十五年，由于性格相合，感情十分融洽。我母亲是一家之主，具有很大的权力；父亲则自愿服从母亲，他只争取一点：在阿普拉克辛或其他市场找寻各种古玩和珍奇品，特别是贵重瓷器（当时古董商很多）的自由，他对这些古玩十分内行。

我父母婚后生活的头几年是跟我祖母和成员众多的大家庭一起度过的。可是过了五年光景，我祖母谢世，大家庭便解体了，我母亲说服我父亲在尼古拉耶夫·苏霍波特内依医院附近买了一幢房子和一大块与房子相连的土地（约两俄亩^①），这块地包括如今的亚罗斯拉夫街和科斯特罗姆街，与小沼泽街相通，直到什季格利茨工厂。

我能够记事是从一八四九年四月，也就是从两岁零八个月开始的。我们家的院子里有个破旧的板棚，我母亲决定把它拆除，盖个新的。工人们聚在一起，做好必要的工作，只剩下把板棚推倒了。我母亲走到玻璃走廊里，想从远处看这活儿怎么干下去，她后面跟着我那好奇的保姆，手里抱着我。糟糕的是，住在院子紧里面的运货马车夫们拖拖拉拉；大家朝他们喊叫，要他们快点把马车赶过去，于是一长列马车便鱼贯地驶走了。看样子，似乎所有的马车都已走掉；但是，当工人们刚使足劲儿准备把板棚推倒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辆迟到的马车。大家明白，如

① 1俄亩等于1.09公顷。——译者注

果那辆马车不冲过去，那么，车夫和他的马就一定会被坍塌的板棚压死。倒下来的板棚发出可怕的开裂声，在场的人都恐怖地喊叫起来，一股股的尘柱飞腾，在起初的一刹那，大家看不清楚，有没有发生灾难？幸而平安无事，但是母亲和保姆的惊呼把我吓得拼命喊叫起来。后来我曾问及这件事发生的确切时间，我父亲看了家庭记事以后证实，那个新板棚是在一八四九年春天建造的。

第二件我能够回忆起来的事是我三岁那年害的一场病。我不明白我害的是什么病，只晓得医生吩咐在我胸口放上水蛭。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多么讨厌这些蠕动的软体虫，多么怕它们，又多么想把它们从胸口扯掉。我同样清楚地记得，我母亲怎样带我乘车去领圣餐，在垂怜众生的圣母像（在什帕列尔纳伊教堂）前祈祷。我看到母亲和保姆一边祈祷，一边哭泣，我自己也画着十字，泪如雨下。祈祷后的第二天，我的病情出现了转机，身体开始迅速复元。一般来说，我们家的孩子很少生病。当然，伤风咳嗽是难免的，但是所有的病痛都用家里的土办法医治，一切也能顺利地对付过去。

我怀着最愉快的心情忆起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我的父母钟爱自己的子女，从来也不无故责罚我们。家庭生活安宁平静，有条不紊，彼此和睦相处，没有发生过什么灾祸或者家庭悲剧。家里给我们吃饱喝足，每天有人带我们去散步，一到夏天，我们便从早到晚坐在花园里；冬天则从设置在那里的一座小冰山上溜着冰，滑行而下。大人不常给我们买玩具，因此，我们对玩具很珍惜和爱护。我们根本没有儿童读物，谁也无意“培养”我们。有时候，大人们给我们讲故事，多半是父亲下班回来，吃过中饭，在长沙发上躺下，把孩子们叫到身边，就开始讲起来。他有一个

故事讲到傻瓜伊万努什卡，但故事内容常有变动，我和弟弟^①老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人们把伊万努什卡称为傻瓜，而他实际上却聪明非凡，能从各式各样的灾难中脱身？我们的娱乐很少：在圣诞节，枞树上每晚点起灯来，开家庭化装会；在谢肉节，我们被带到游艺场，乘坐芬兰人的马车游玩。每年两次——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我们上戏院看戏，多半是歌剧和芭蕾舞。娱乐少，我们就对它们特别珍视，我们看到的那些演出接连好几个月使我们心向往之。[……]^②

二

接受教育

下面我要谈谈自己所受的教育。从九岁到十二岁，我在圣安娜小学（在基罗奇纳亚街）求学。除了宗教课外，所有的课程都是用德语讲的，懂得这种语言对我以后和丈夫在国外的那几年生活很有用。一八五八年，京城里开设了第一所女子中学（玛利英女子中学），这年秋天，我就到那儿去上学，读二年级。我在那儿学习觉得挺轻松，升到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奖给我几册书，临到毕业，我又得到了一枚银质奖章。在我毕业前一年，尼·阿·维什涅格拉茨基^③开办了一所师范学校，那些有志于继续求学的人进了这所学校。一八六四年，我也入了学。在

① 指伊凡·格里戈利耶维奇·斯尼特金（1849—1887）。——译者注

② 方括号系原书编者所加，下同。——译者注

③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维什涅格拉茨基（1824—1872），俄国语文学硕士。（凡本书脚注未标明出处者均系译者根据原书“人名索引”中的介绍文字所加。）

那个时候，人们醉心于自然科学，我受到这股潮流的影响，以为物理、化学和动物学是某种“天启”，于是我便进了这所学校的物理-数学班。可是过了不久，我确信我所选的课程不合乎我的爱好，因而我学得很差劲：比如说，在做盐的结晶实验之际，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读小说，没有去注意观察烧瓶和曲颈瓶，结果，它们遭了难；在听动物学讲课时，我感到有趣，但是碰到上实验课，大家把死猫制成切片时，我就狼狈不堪，厌恶得晕了过去。在这一年的学业中，我记得特别牢的只有弗·瓦·尼科利斯基教授关于俄国文学的天才讲课，在这位教授上课时，两个班的女同学都前往听讲。

一八六五年夏天，我碰到一件伤心事：我父亲得了不治之症，将不久于人世。这时，我舍不得我那有病的亲人整日整夜孤零零地躺着，我便决定暂时辍学。由于父亲通宵失眠，我便接连几小时给他读狄更斯^①的小说，碰上他能在单调的诵读声中小睡片刻，我就感到十分满足。

一八六六年初，出现了开办速记专修班的布告，专修班设在第六男子中学的校舍里，讲课人是帕·马·奥利欣^②。我打听到课是在晚间上的（当时我父亲已经退休），我就决定进速记专修班。我父亲坚决主张我进这个专修班，他对我为了他的病而放弃师范学校的学业感到惋惜。开头，我觉得这速记学实在掌握不了，听了五六堂课以后，我确信这玩意儿简直莫名其妙，无论我费多大的劲也休想学会。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父亲的时候，他非常生气，责备我缺乏耐心和毅力，要我保证继续学下去，说他

① 查理·狄更斯(1812—1870)，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著有《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双城记》等。——译者注

② 帕维尔·马特维耶维奇·奥利欣(1830—1915)，医生，翻译工作者，速记学教师。

相信我一定会锻炼成一个优秀的速记员。我的慈父仿佛预见到，是速记学使我找到了幸福。

一八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我父亲去世。这是我一生中经受的第一次不幸。我悲痛万分，以泪洗面，接连许多天待在大奥赫塔亡父的墓旁，丧父的剧痛始终无法缓解。我母亲看到我心情沉重，郁郁不欢，十分焦急，央求我找个工作做。遗憾的是，速记课已经停讲，但是我们的教师，好心的帕·马·奥利欣了解我的苦衷，知道我缺了许多课，表示愿意用函授的办法给我补课。一星期两次，我得根据某本书，用速记法记下其中的两三百页，把它寄给老师。奥利欣纠正他在速记记录中发现的错误后，再把它寄还给我。夏季接连三个月的函授使我的速记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又加我那个回家来过暑假的兄弟乐平每天都为我不念材料，让我听写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这样，我就渐渐地掌握了速记术，不仅记得正确，而且速度快。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一八六六年九月速记专修班开学的时候，我是奥利欣所信任、可以推荐去从事文学工作的唯一的女学生。

三

人家怎样给我“说媒”！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还保留着替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们说媒的旧风俗，这种风俗不仅保留在商人们中间，而且象我们那样中等知识分子的家庭里也同样存在。凡是上了岁数的妇女和中年妇女，家里有着女儿或侄女，总是竭力为她们寻找对象，替她们安排终身大事。但是，也有一些妇女，她们干这种事并非纯然